

《小字录》和《古贤小字录》版本考

刘向东

一、前人的版本鉴定意见

《古贤小字录》，明弘治十七年（1504）吴大有刻本。前有序文一则，序后署“弘治龙集甲子春仲既望吉赐进士出身举直大夫知邓州事昆山吴大有书于筹治轩”。卷端首行题“古贤小字录”；次行题“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陈思纂次”；三行题“昆山后学吴大有较刊”；四行以下为正文；末页最后一行题“古贤小字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小字录》，明活字印本。无序跋。卷端首行题名“小字录”，次行题“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陈思纂次”，三行以下为正文；末页最后一行题“小字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也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两书正文内容几乎一样。

清人黄丕烈曾收藏两书，并撰写题跋，描述版本曰：

余向藏《古贤小字录》，系昭文邵朗仙赠余者，云以青蚨三星得之书摊者。“陈思纂次”一行后多“昆山后学吴大有较刊”一行，此册无之。始犹疑其板刻有异，细审之，皆活字板，而前所得者为后印，兹所得者为初印也。何以明之，盖此板后归吴氏，故增入一行，其改易原书一行，以“姓刘”二字移“宋高祖武帝”下，而去“氏”字，又去小注“宋本纪”三字以迁就之，其痕迹显然。兹册古色古香，初入眼疑为旧刻，故书友欲以充宋元板，余亦因其古而出番饼二枚易之，重付装潢，可谓好事矣。辛未十月二十有五，复翁记。^①

可知黄丕烈认为两种“小字录”都是活字本，《小字录》为初印，《古贤小字录》为后印。两本的文字异同是《小字录》版片归吴大有后，吴氏剗改版片造成的。

活字本《小字录》后流入铁琴铜剑楼，《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著录：

^①黄丕烈著，周少川点校：《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

此明弘治间吴郡孙凤以活字板印行,后有黄菟圃跋。据菟翁跋语知此板后归昆山吴氏,于“陈思纂次”一行后添出“昆山后学吴大有校刊”一行。书中挽改之迹显然。此尚是初印本也。^①

叶德辉曾针对瞿氏说法中显而易见的错误进行批评,说:“瞿说非是。活字印本随聚随散,安有以板归人之理?此明为两人,一以活字印行,一即据活字本重刊。瞿误以二本为一本耳。”^②实则瞿氏的错误黄丕烈就犯了。

铁琴铜剑楼的后人瞿凤起(1908-1987),1935年在将《小字录》交“四部丛刊”影印时撰写了题跋,判断《古贤小字录》为刻本,纠正了上述错误。他说:

昨偶与友人宗礼白兄谈及,因出其曩年所收莫子偲遗书《古贤小字录》相示,阅之,与菟圃跋所记各点无不吻合,其书自第一页下半页起行款全同,殆所谓后印本欤?但细察其字体不类活字,且卷首有“弘治甲子吴大有序”,略谓版刻寡传,获睹者少,爰伐梓托寿,以表良工之苦心,因纪绣梓岁月云云。味其语气,确系侵木,而非活字,菟圃或未见此序,因而致误。^③

1939年,潘景郑(1907-2003)再次将《古贤小字录》误判为活字本,说:

陈氏此书有弘治活字本,吾乡黄菟翁有之,跋称初印本无“昆山后学吴大有较刊”一行,后板归吴氏,遂增入一行者,菟翁具藏两本,故能得其原委如此。菟翁跋本,后归瞿氏铁琴铜剑楼,今瞿目所录是也。顷见此《古贤小字录》一帙,开卷次行题“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陈思纂”,次三行题“昆山后学吴大有较刊”。前有弘治甲子吴大有序,证诸菟翁跋语,则此本为后印者,然同出一源,其内容固无分轩轻也。^④

从上述诸位版本鉴定大家对《小字录》的鉴定意见,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活字本鉴定方法日益进步,但是缓慢发展的脉络:乾嘉时期,活字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版本形式,尚未引起版本学家的普遍注意,活字本的鉴定方法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科学的经验;清末民初,藏书家对活字本的鉴定方法才稍稍加以归纳,处于总结经验的阶段,叶德辉、瞿凤起、潘景郑先后不同的鉴定意见,表明当时人们处于对活字印本鉴定方法仍模糊不清的状况。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编辑的《古旧图书业务知识》,其中有最早见于文字的活字印本鉴定方法的概括^⑤,这个现在看来文字还略显粗糙的方法里,就有“活字印书,印完,版即拆散,如需再印,即行再排”的相关描述。自此以后,我们当不至于再产生如黄丕烈那样的鉴定错误了。

①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38页。

②叶德辉著,李庆西校:《书林清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③瞿凤起:《小字录后跋》,《四部丛刊》本。

④潘景郑:《著硯楼题跋》“明弘治活字本古贤小字录”条,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07页。

⑤河北省文化局编:《古旧图书业务知识》,1962年内部读物,第241-242页。

二、《小字录》版本考证

历来的古籍版本鉴定方法,无外乎考订和目鉴两种。在古籍版本鉴定实践中,两种方法互有短长,缺一不可。通常需要对古籍的版式字体、纸张墨色、序跋牌记、书名作者、卷册残缺、版本先后等等各项逐一观察考订,直至对版本做出整体判断。

笔者注意到,很多相关著作对考订方法进行的经验总结,多有精彩的描述;而对目鉴方法的重要性,则少见提及。

对目鉴方法的重要性注意不够的古籍版本鉴定方法是有缺陷的。尤其是版本信息比较缺乏,或者处于残损状态的古籍(而在古籍整理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这类图籍),往往更需要我们有丰富的目鉴经验。鉴定这类无序无跋,没有明确纪年的古籍,传统的方法是依据字体版式、纸张墨色,即通过目鉴的方法来鉴定版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大量著录为“明刻本”“清刻本”的古籍,都是因为古籍中缺少可以明确断代的依据,运用目鉴方法形成的版本鉴定意见。

《小字录》即是无序无跋,书中也没有明确纪年可供版本鉴定的典型案例。

《小字录》目测为活字印本没有疑问:理由一:可以直接观察到活字本的字体歪斜,行气不整等明显特征;二、笔者基于活字印刷必须先制作排版盘^①的思路,反复验证了大量的活字印本,掌握了通过寻找“版盘”的形态来确认活字印本的方法,行之有效。据对《小字录》的目验,根据书口的“小字录”,有两种不同的字体组合反复出现,可以推定此书在活字排版时使用了两个版盘。雕版则不同,版框及书口留下的字体、印痕粗看都一样,细看则版版不一;三、黄丕烈氏等诸位大家认为此书是活字印本的一致意见也应该采纳。

而要确切考证出《小字录》的排印年代则有些困难。

无序无跋的古籍版本鉴定多依靠目鉴法。目鉴的对象主要就是字体版式,纸张墨色,而其中最最有规律可循的是字体。掌握目鉴法的人们都知道,各个朝代刻书的字体有各自的特征。比如真正意义上的横平竖直的匠体字出现在明正德嘉靖年间。如果看到用匠体字刻印的古籍,就可以大致判断刻印时间在正嘉以后。但是活字印本的字体和雕版又有不同,年代风格并不明显。这也是有些活字印本经常被鉴定成“宋本”、“旧本”的原因之一。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中就著录有数种宋活字本,如《韦苏州集》、《诗经》《帝学》等,经今人鉴定都是明清活字印本。

既然目鉴字体风格无法鉴定出《小字录》的排印年代,那就得再想其他方法。

①此处及以下各处的“版盘”,指活字印版。这种印版一般用金属或木质或泥质制作,用来排列活字、中缝、行线以及承装固版材料等,以供印刷。文献中叫法不一,如“印盔”、“槽版”、“印板”、“排版盘”等等,笔者在文中统称“版盘”。

在明代活字印本中,《曹子建集》和《唐五十家诗集》(此书无固定书名,本文书名取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和下文的《唐人五十家诗集》为同一部书)字体、行款、版式和《小字录》极为相似。事实上,前人如徐鹏、陈尚君已经注意到三书行款一致,字体仿佛,认为三书大致同时印刷,可以一并考证版本^①。笔者的思路也是如此:如果能考证出明活字本《曹子建集》、《唐五十家诗集》的准确版本年代,也可以供《小字录》鉴定版本年代时参照。

《曹子建集》书中没有确切的纪年依据,因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铜活字印本”。对此书版本进行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最为明晰者当为赵元方的鉴定:明正德五年(1510)前活字印本。依据是正德五年舒贞刻本《曹集》前有田澜序云“舒曰:‘往岁过长洲,得徐氏《子建集》百部,行且卖之,无余矣。近亦多问此集,贞久无以应之。盖彼活字板,初有数,而今不可得也’”。并且赵元方氏还将《曹子建集》和《唐五十家诗集》两本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得出“颇疑其同出一源,顾不得显证”的判断,后来看到《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有“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诗活字本《李端集》”,于是又说:“《曹集》、《唐集》同出于徐氏,而刻于弘正之间也……积年未解之结,一旦得解,何快如之!”^②

《唐五十家诗集》书中也无记载年代的序跋可资参考,版本鉴定也困难重重。因此历来鉴定意见不一,好在近年已经趋于统一。其中陈尚君的考证时间较后(使用的证据和赵元方氏不约而同),结论也最为可靠:“《唐人五十家诗集》之编辑和印行者是徐缙(缙字子谷,号崦西,苏州西山人,明弘治十八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明正嘉间用铜活字排印本。”^③结合目验此书的版式字体,陈尚君的判断当无大误。

现在的问题是,依赵元方的鉴定意见,《曹子建集》、《唐五十家诗集》均排印于明正德五年前,也可以说是“弘正之间”;依陈尚君的鉴定,《唐五十家诗集》为明正嘉间铜活字印本。两者意见实际是有区别的,孰是孰非,都对《小字录》的版本鉴定结果产生影响。

笔者多年对活字印本的工艺进行研究。有意识将活字版盘的制作技术必然在印刷物上留下的各种痕迹引进活字印本的鉴定方法,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在对明代活字印本的考察中,将有些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的活字印本确立了同时同地同用一副活字排印的结果(拟另撰文介绍)。沿着这个思路,对《曹子建集》、《唐五十家诗集》和《小字录》的字体行款版式进行考察,比较结果如下。

①徐鹏:《前言》,《唐五十家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0页。陈尚君:《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印行者考》,收入《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44-247页。

②王玉良:《明铜活字本〈曹子建集〉与〈杜审言集〉赵元方题跋》,《文献》1991年3期,第207-209页。

③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第244-247页。

1.《曹子建集》和《唐五十家诗集》版框高度不一致,前者尺寸为20.1~20.6×13.2~14.2CM;后者则为18.8~19.2×12.2~13.1CM。据此可以认为两书使用的不是一副版盘。2.《曹子建集》和《唐五十家诗集》使用的不是一副活字。《曹子建集》使用的“建”字“聿”右下角都加有一点,“留”字下面的“田”字均出头写作“由”;《唐五十家诗集》则“建”字没有多余的一点,“留”字下面就是“田”字。笔者对两书的用字进行了梳理,如此不同的字较多。3.《唐五十家诗集》使用了两种字体。多数字和《曹子建集》的字体风格虽极为相似,但仍然可以看出细微的差别。另有少部分字明显具有嘉靖年代刻本字横平竖直的风格,据分析系补刻而成。据此可知,二书不是使用同一副活字排印,《曹子建集》在前,《唐五十家诗集》在后。赵元方氏作出的《曹子建集》和《唐五十家诗集》“同出一源”的判断有误差。陈尚君氏认为《唐五十家诗集》为“明正嘉间…排印本”的结论则非常准确。

笔者判断,《曹集》排印于正德五年以前较为可靠;唐集排印则稍晚,从补刻的字体带有嘉靖风格判断,约排印于明嘉靖年间;刻《曹集》的徐氏或和刻唐集的徐缙不是一人。

而《小字录》版框尺寸为20~20.4×13.1~14.1CM,考虑到版盘制作确有误差以及各家测量方法的差异造成的误差等因素,则该书与《曹子建集》版框尺寸相同。两书字符大小、版式特征、字形写法(笔者检验“建”“留”“世”“处”“美”“量”“安”等一批字)等都高度一致。字体风格也极为一致。说明这两种书使用的是一副活字及版盘。古人用同一副活字排印书籍的时间跨度一般不大,由此判断两书排印时间相去不远。既然《曹子建集》排印于明正德五年前,将同样字体版式的《小字录》排印时间也定为明正德五年前就不至大误。

有助于确认《小字录》是明正德五年前印本的旁证还有:《小字录》书中夹有一页明弘治十五年(1502)都穆为“阴何诗”撰写的跋,原为《小字录》的“覆背纸”,被黄丕烈氏在装潢时附于《小字录》书末。此跋也是活字印刷,字体行款、纸张墨色和《小字录》一模一样,故此跋所署的年代大致也就是《小字录》排印的年代。

明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1510),其间不到十年,《小字录》的排印当就在这段时间内。

三、《古贤小字录》版本考证

《古贤小字录》版本的鉴定看似不成问题:书前有弘治十七年(1504)的序文;又有“吴大有较刊”明确的校刊人姓名;再据目鉴字体版式显系刻本。因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鉴定意见为“明弘治十七年吴大有刻本”。

上文已述,两种“小字录”除首页末页稍有不同外,正文从字体版式到文字内容高度一致,如不是精心翻刻,不可能造成连黄丕烈都看成一版初印后印的效果。《古贤小字录》是弘治十七年刻本,《小字录》是弘治正德间印本,从

时间顺序来看,既可以是《小字录》翻刻《古贤小字录》,也可以是相反。

究竟谁是谁的翻刻本?前引诸位大家的鉴定意见一致认为是《古贤小字录》翻刻了《小字录》。细细推敲他们的意见,确实言之成理。

笔者还可以从印刷工艺角度认定《古贤小字录》翻刻《小字录》,而不是相反。若以雕版方式翻刻活字本,简单可行。只需将活字本影写或直接用书页反贴上版,然后精心雕刻就可以完成。只要刻工技术足够好,就能做到翻刻本和底本几乎一样。古籍版本鉴定中困扰我们的难题之一,就是不易区分原本和翻刻本,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种翻刻的技术可以做到超乎想象的一致。但若以活字排版方式翻刻雕版,则不可能做到字体版式和原雕版几乎一样。我们就以翻刻《小字录》举例。首先制作的活字符号就必须依据底本的字体为楷模,摹写刻印成一颗颗字丁;排版时必须在相同的行格排上和底本完全相同的字。“完全相同的字”的含义是:假设刻本中有20个“之”字,其字形不可能完全一致,据此翻刻的活字字符如果完全吻合的话,则在排版遇到该字时,必须从20个“之”字中找出和原雕版字形完全相同的那个来排放。再加上在固版过程中填充物的大小以及字丁自身的变形等因素影响,还可能引起字丁位置的偏移,造成字与字之间的关系绝不会与雕版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断言,用活字翻排雕版,只能做到内容上的一致,不可能做到形式上的一致。

肯定了是《古贤小字录》翻刻《小字录》,那么,《古贤小字录》的刻书年代必然晚于《小字录》。但《古贤小字录》是否是弘治十七年翻刻的呢?

笔者认为,《古贤小字录》不是弘治年间刻本。这可从该书避讳字考知。明代避讳较之宋代松弛,明初、中期基本未见避讳,明末才稍稍紧密。据验证存世的明代刻本,在天启崇祯年间,因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讳,改“校”为“较”的确有很多。王重民对此作过深入研究,台湾李清志也非常注意“较”字在版本鉴定实践中的作用^①。两人的意见均强调一点:但凡书中出现因避讳改“校”为“较”的现象,均出现在明天启年间以后。笔者详细检阅了王重民、李清志著作中举例的约百条记载,结合经眼的古籍检验,无一不准。因此,据《古贤小字录》首页第三行“昆山后学吴大有较刊”的“较”字,笔者倾向于《古贤小字录》的刻印时间不会早于明天启年间。

前之所以对《古贤小字录》上明显的避讳“较”字视而不见,依然将此书看做明弘治刻本的原因大约是:从通常的鉴定经验来看,利用避讳字鉴定古籍版本必须结合对字体版式,序跋牌记做整体的考察。而此书的字体版式,绝不同于明末常见的版刻风格,加上书中明确有弘治十七年的序文,故容易造成误判。

上文我们已经说明了《古贤小字录》刻本应该是据活字本《小字录》翻刻

^①王重民著:《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李清志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而来,则它的字体风格与明末那种长瘦的仿宋字不同,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们现在再读黄丕烈的题跋“书友欲以(《小字录》)充宋元板”、“古色古香,初入眼疑为旧刻”,可以想见,清嘉庆年间将活字印本的《小字录》看成“旧刻”、“宋元板”的人肯定不在少数。那么,根据字体版式,更兼书前有“弘治十七年”的序文,将《古贤小字录》误定为明弘治年间刻本也确实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贤小字录》翻刻于明末(不早于天启),著录为弘治刻本依据不足。当然,苦于无准确的年代依据,最为妥当的方法是著录为明刻本。

附记:台湾“国家图书馆”也藏有《古贤小字录》“明弘治甲子(十七年)昆山吴大有刊本”(索书号:205.8 02878),有弘治十七年刻书序,卷端无“昆山后学吴大有较刊”一行,序文及正文的字体行款板式完全不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而文本内容则完全相同。目测字体版式,是典型的嘉靖万历年间刻本。不知台湾何以就依据序文著录为“明弘治刻本”。这种将明显使用了嘉万间字体的刻本错误著录为弘治刻本的案例,也说明古籍编目人员必须提高目鉴能力。

作者工作单位:扬州市图书馆